“英国旅行文学研究”专题主持人语:

旅行文学是一种表现旅行的多元文学范式,涉及游记、航海记以及表现旅行的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史诗、叙事诗和小说等。由于其表现范式的复杂性,旅行文学长期以来受文学评论界的冷遇,只是为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征用,成为这些学科发展的重要材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获得立项,标志着我国在英国旅行文学史论研究方面的重大进展。此专题反映了英国旅行文学史论研究方面的阶段性成果。《18世纪英国壮游文学中的绅士身份与英国性建构》探讨英国壮游文学范式的历史生成过程以及该种旅行文学范式中所体现的绅士身份培养与英国性建构。《英国早期旅行叙事中旅行者的沉默》揭示英国早期旅行文学中旅行者沉默的现象以及旅行者沉默的原因。《论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中的旅行叙事表征》则聚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中的旅行叙事和主题表征,认为剧中的旅行叙事兼具事实和想象的双重话语特征。《月球书写与弥尔顿的〈失乐园〉——17世纪英国宇宙旅行文学中的“多重世界”》,探讨从15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到17世纪英国人的“多重世界”宇宙说,以及这种学说在弥尔顿及其他17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书写和表现。论文各有侧重,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早期英国旅行文学的风貌。

——田俊武

月球书写与弥尔顿的《失乐园》 ——17世纪英国宇宙旅行文学中的“多重世界”

张建萍¹ 田俊武²

(1. 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摘要:随着《天体运行论》在1543年出版,“新天文学”领域成就斐然,一系列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的有形宇宙假设相继出现,后续各种天文观测技术与实践更是突飞猛进。此背景下,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宇宙旅行文学”重新流行,想象式描述着星球之间的互动、各星球上的生物状态等。“多重世界”是其书写的对象也是存在前提。因17世纪英国正好处于新、旧天文学交替时期,此时的“多重世界”呈现出两个特点。首先,违背宗教教义的它曾一度举步维艰,最终不得不妥协为基督教化后的世界;其次,伽利略等的发现主要聚焦月球,故“多重世界”的故事常常发生在那里,直至牛顿1687年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种空间束缚才逐渐解除。《失乐园》在17世纪英国宇宙旅行文学中非常特殊,弥尔顿笔下的“多重世界”因“中和”特征不同于当时诸多月球书写:态度方面,它中和了开普勒的“激进”和伽利略的“保守”;内容方面,它中和了新、旧有形宇宙假设;范围方面,它中和了月球书写与其他星球书写。因其特殊性,燕卜苏又将它称作“弥尔顿类型”的“宇宙旅行文学”。

关键词:多重世界;宇宙旅行文学;月球书写;《失乐园》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6-0001-11

收稿日期:2023-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ZD28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BWW0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建萍,女,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复兴文学研究。

田俊武,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旅行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张建萍,田俊武.月球书写与弥尔顿的《失乐园》——17世纪英国宇宙旅行文学中的“多重世界”[J].外国语文,2023(6):1-11.

0 引言

一般认为,都铎-斯图亚特时期,英国人“对超越既定范围的知识无比狂热”(Nicolson, 1940: 84)。地理方面,在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等推动下出现的大航海时代,许多不为人知的国家与地区被逐一发现。天文学领域同样成就斐然。随着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Spheres*)主要聚焦“有形宇宙”变化(Coffin, 1937:Pint)的“新天文学”时代到来,先是一系列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的假设相继出现:“哥白尼日心模式”中,太阳成为有限宇宙的中心,各星球依旧固定在天球板上旋转;“第谷日心/地心混合模式”里,有限宇宙的中心依然是地球,但只有太阳绕它旋转,其他星球则绕太阳运动;“迪格斯无限模式”内,太阳又成了无限宇宙的中心。

这些假设进一步促进了天文观测在技术和实践上的双重猛进。意大利人玻尔塔(G. B. D. Porta)、英国人迪格斯(Leonard Digges)和荷兰人利普希(Hans Lipperhey)等都曾致力于相关发明,其中以伽利略1609年成功制造人类历史上首台天文望远镜最为轰动。它标志着肉眼观察宇宙时代的结束,之后人们利用各种科学工具便可知晓遥远星空的真实情况。不仅如此,宇宙旅行的热情也被点燃,其中17世纪30年代,克里斯托弗·格林伯格(Christopher Grienberger)等着手进行的航空飞行器试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这些探索最终失败,但对宇宙的梦想从未因此停止,反而相较之前更加活跃、生动。也是在该时期,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宇宙旅行文学”(Cosmic Voyage Literature)重新流行,“诗歌、散文、讽刺、戏剧里……到处都是”(Nicolson, 1940:85)。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宇宙形象研究的先驱学者玛乔莉·霍普·尼克森(Nicolson, 1940:92)甚至认为这种文学体裁正式成形于17世纪,它“不是要把读者带到那些能在地图上标识出来的地理前哨,而是太空中的其他星球上”(Nicolson, 1948:7-8)。

“宇宙旅行文学”想象式地描述星球之间的互动、各星球上的生物状态等。作为其书写的对象和前提,“多重世界”(other worlds)主要指基于科技发展和物理定律推演的一种天文学假设:宇宙中同时存在多个世界,地球仅是其中之一。始终伴随“多重世界”的是另外一个假设:“地外生物”^①,即存在于地球以外的生命体或文明。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20世纪后半期以来,这两个术语中,相比“多重世界”,我们更熟悉“地外生物”的说法。实际上,研究证明“多重世界”一词出现更早(Dick, 1982:2)。目前二者几乎通用,“多重世界”主要指那些有智慧生物生存的星球(Dick, 1982:2)。

随着“新天文学”的快速发展,“外星人进入地球的大门早在1543年就已不经意地打开了”(Crowe et al., 2013:4),但在新、旧天文学交替背景下,“多重世界”的表现也非常特殊。首先,因与宗教教义违背,它曾经举步维艰,最终不得不妥协为基督教化世界。其次,因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发现多聚焦于月球,加之《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等备受读者欢迎,“多重世界”的故事也常常发生在那里,直至牛顿(Isaac Newton)1687年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这种空间束缚才逐渐解除。月球则成为前往太阳系或更远星球的中间站。

^① extraterrestrial life,简称E. I.,即外星人。

虽有少数作家将想象力延伸至月球之外,但当时英国宇宙旅行文学多以书写基督教化的月球世界为主。此时,作为“多重世界”的主要例证之一,不同于强调位置变化的跨月叙事^①,月球书写主要描述居住在那里的智慧生物及其生存状态。代表作有弗朗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的《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和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月球世界的发现》(*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 Moon*)等。

作为“可能是高格调文学中,最伟大的宇宙旅行书写”(Tanner, 1986: 268)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其“多重世界”因“中和”特征明显不同于当时诸多月球书写:态度方面,中和了开普勒的“勇敢”和伽利略的“保守”;内容方面,中和了新、旧有形宇宙假设;范围方面,中和了月球与其他星球书写。因其特殊性,燕卜苏(Empson, 1957: 337)将它称为“弥尔顿类型”的“宇宙旅行文学”。

1 较量:争议声中的“多重世界”

从诞生至今,始终处于争议中的“多重世界”历经变迁。古希腊人恐怕算得上是多重世界思想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了”(胡阿特等, 2016: 5)。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认为世界的本原“阿派朗”(apeiron)数量无限多,且能生成无数个世界。不过学界认为该观点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可确定的是,前苏格拉底学派的留基波(Leukipp)与德谟克利特(Demokrit)等的原子论认为万物皆由不可分割的最小基本微粒——原子——组成,原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结合和重组,所以我们的世界只不过是所有可能性中的一种。这样,一个最早的“多重世界”理论得以建构。后续伊壁鸠鲁(Epicurus)接受了此种假设,他的学生卢克莱修(1981: 123-124)更在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第二卷里大胆预测“任何事物都只是某一种类的一员而已,在同类之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个体……大地、太阳、月亮、海洋和其他都不是孤单存在——在数量上无限之多”。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篇明确提出的“多重世界”的西方文献,且在古典时期,其追随者众多,普鲁塔克(Plutarch)便是其中一位。但同一时期,“多重世界”也备受争议。代表学者是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者在《蒂迈欧篇》(*Timaeus*)里明确提出因为世间只有一名造物主,故只能有一个世界;后者则认为,五种基本元素(土、气、火、水和以太)在宇宙中央或边缘朝着“自然位置”上浮或下沉,其中,由土构成的物质会永远沉向宇宙中央,所以地球一定是唯一世界,不可能存在其他固态实体。也是从二人生活的时代起,“多重世界”争论逐渐显性化,相比之下,“地外生物”极少得到关注。

对“地外生物”的讨论同步于公元3至4世纪,基督教的大范围传播,却与“多重世界”共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销声匿迹。“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有着一千一百年的中断期。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罗伯茨, 2020: 43)表面看,这是因为神父们不断镇压伊壁鸠鲁派学说,烧毁或粉碎大批作品,随之原子论、享乐的追求及“多重世界”观念逐渐踪迹全无。本质上是因为“多重世界”对“地外生物”的暗示让人们思考诸如人类是否唯一、亚当原罪是否重复和上帝是否进行多次救赎等《圣经》中从未涉及的内容,进而会质疑基督教。故在找到“地外生物”存在的理由前,这些假设始终被迫沉寂无声。即使该时期出现过中世纪传奇故事,但它们也仅仅局限在地球

^① “跨月叙事”(Translunar Narrative)的详解见艾荣·帕雷特(Aaron Parrett)2004年的《西方传统中的跨月叙事》(*The Translunar Narrative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上。直至13世纪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e)首次尝试将两者结合,认为其他世界也由上帝制造,同样是其能力与智慧的展现,由此“多重世界”和“地外生物”等假设才又开始复苏。助力性事件一是1417年,佛罗伦萨书籍收藏家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在德国南部的一所修道院中发现了《物性论》,该诗被重印上千份后,迅速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伊壁鸠鲁学说的兴趣。事件二是尼古拉的库萨(Nicholas of Cusa)等继承圣文德衣钵,发展了神意化的“多重世界”。“多重世界”与基督教信仰逐渐融合的过程中,追随者也慢慢增多。代表学者是公开声明世界虽然多重,但上帝的地位始终不变的路德教徒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 Melancthon)。代表作品则是皮埃尔·博雷尔(Pierre Borel)的《一部证明多重世界的专著》(*A New Treatise Proving a Multiplicity of Worlds*)。

文艺复兴时期,尤其16世纪之后,“多重世界”被广泛讨论还与另外两个事件有关。一是在当时,原子论支持者增多,伽桑狄(Pierre Gassendi)、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和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等均在此列。伦敦的诺森伯兰圈子(Northumberland circle)更是汇集了大批支持者:天文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哲学家罗伯特·诺顿(Robert Norton)、托马斯·艾伦(Thomas Allen),此外还有约翰·邓恩(John Donne)、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和乔治·皮尔(George Peele)等诗人与作家,随之“多重世界”也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并广为流传。二是新天文学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多重世界”讨论的爆发。这一方面的贡献者中,哥白尼排在首位,并非因为他相信“地外生物”的存在,而是其观测和计算结果大幅降低了地球在有形宇宙中的地位:它与其他星球一样。当然,深知这些假设会遇到阻力的他,直至去世前才发表《天体运行论》。相比之下,哥白尼的忠实追随者布鲁诺(Giordano Bruno)就没这么谨慎了。他并非因为支持日心模式,而是因支持隐藏其后的“无限宇宙模式”和作为“多重世界的代表”被迫害致死。“无限宇宙模式”最初出现于16世纪后半期,由当时英国最权威的天文观察家托马斯·迪格斯(Thomas Digges)在“哥白尼日心模式”和“第谷日心/地心混合模式”基础上提出:太阳位于宇宙中心,各星球不再固定在天球板上,而是零星分布于无限宇宙中。它让人们的认知从封闭宇宙跨越到一个无穷或至少也是极大的宇宙,这是新天文学领域的重要成就之一。布鲁诺旅居英国时接触到了迪格斯思想,随之在《论无限、宇宙和众世界》(*De L'infinito, Universo e Mondi*)等中假设在这个无限宇宙中,必然有别的“地球”和生物存在。受当时滞后的天文观测技术影响,这种思想对世人来说非常激进。

十多年之后的1609年,随着望远镜出现,随之各种可观察到的天文学成果中,跟地球相似的月球乃至更多星球进入人们视野,“多重世界”假设的科学基础也逐渐增强。不仅如此,人们还纷纷猜测遥远星空中智慧生物的生存方式。此背景下,大批“多重世界”书写涌现。与中世纪“多重世界”的遭遇一样,它同样面临着与基督教教义冲突的命运,加之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宗教派别林立、错综复杂,故情况更严重:如加尔文教坚持上帝唯一可见的作品只有地球,多重世界“错误古怪且忤神”(Daneau, 1579:25-27)。新教改革者对它也不热情。因此,众多哲学家、思想家和天文学家同样谨慎,因为言论稍有不慎,极端情况下可能被流放或烧死。解决二者的冲突变得尤为重要,不然“多重世界”就还会再次被迫销声匿迹。此背景下的“多重世界”书写呈现出两个特征:(1)以荒诞情节为形式,以娱乐大众为目的,遮盖背后的新天文学诉求;(2)“地外生物”常被基督教化。即便如此,它们有时也未能幸免于封杀,著名的例子是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虽在《关于世界多元性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中再三保证本书并不相悖于基督教所宣扬的地球独特性,却因里面的生物并非亚当后裔,无须上帝拯救而被教会绝然列入禁书之

列。这并不能阻止人们继续用科学方式思考宇宙是否多重和地外生物是否存在等问题。到了17世纪末期,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多重世界”假设已习以为常。标志性事件是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在1698年的《宇宙论》(*Cosmotheoros*)中,开始以严肃而非谐谑的语气探讨了这一问题,他甚至认为金星和木星都有大气,完全具备地外生物存在的必需条件,其他星球也是如此。18、19世纪的哈雷(Edmond Halley)、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蒲伯(Alexander Pope)、康德(Immanuel Kant)、赫歇尔(Friedrich Wilhelm Herschel)、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和潘恩(Thomas Paine)等都充分接受了这一观点。到了20世纪,“多重宇宙”俨然成为人类积极验证的航空梦想,不仅宇宙飞船到了其他星球,各种无线电信号还被用来探测地外生物。可以说,在数世纪的变迁中,“我们是不是宇宙中唯一?”“有没有外星人存在?”等与“多重世界”相关的假设早已摆脱宗教桎梏,成为纯粹有待验证的科学问题。

2 妥协:基督教化的月球书写

17世纪,月球书写成为“宇宙旅行文学”的主流并非偶然。首先,所有天体中,月球离地球最近,我们很自然地将它看作踏出地球后第一个用来思考“多重世界”问题的目标。其次,发明望远镜后,伽利略对月球的观察是他最重要的天文学成就之一。同时随着记录这些观察结果的《星际信使》广泛传播,月球最为人类熟悉。1638年更被称作“英国的月球时刻”(Cressy, 2006:961)。因为在这一年,戈德温的《月中人》和威尔金斯的《月球世界的发现》同时出版。更巧合的是,弥尔顿也在同年的意大利之行中拜访了伽利略。尽管伽利略本人并没有直接提过“多重世界”和“地外生物”的可能性,其作品却多处暗示:有些星球与地球类似。首先,他观察到的月球不像许多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支持者所假设的光滑、均匀且完美,相反,它跟地球表面相似,一样不平坦、充满孔洞和隆起。其次,他记录了木星被四颗卫星环绕,这类似于地月关系,由此可推演宇宙是由诸多卫星围绕行星的“多中心空间”(Campbell, 1999:115),而绝非仅有一个地球中心。同时引人深思的是:如果月亮的环境适合人类居住,那么无限宇宙中的其他星球是不是也这样?

月球世界想象并非为17世纪所特有。早在古希腊时期,泰勒斯(Thales)和菲洛劳斯(Philolaus)就曾设想月球上有人。德谟克利特相信那里有能够藏身的高大山脉和空旷山谷。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则声称看见了生物。受天文观测工具所限,这些都只是大胆假设,但不能否认,正是伊始于此,虚构成为月球书写最大的特征:作为首部月球书写,卢西恩(Lucian)的《真实的故事》(*True History*)^①中:主人公与一群旅者的帆船被飓风卷入外太空。几天后到了月球,发现那里的居民与太阳居民在争夺对“晨星”殖民地的控制权。作者似乎很青睐月球世界,他的另一部主题相仿的作品中,伊卡罗麦尼波斯将手臂绑在老鹰的翅膀上飞上了月球。普鲁塔克在《论月面》(*De Facie*)里认为地球人去世后灵魂会飞到月球。另一个著名的月球书写出现在波斯,菲尔多西(Firdausi)1010年的史诗《王书》(*Shāhnāme*)里描写了月球大战。五个世纪后,意大利的鲁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的《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中,骏马能将人们带到月球等。

月球书写的虚构性从当时一直延续至今。贝尔热拉克(Cyranode Bergerac)的《另一个世界:月

① 《真实的故事》(*True History*)中译文来自周作人的同名译作,被收录在其《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中。

球国家与帝国诙谐史》(*The Other World: The Comical History of the States and Empires of the Moon*, 1657)、麦克德默(Murtagh McDermot)的《月球之旅》(*A Trip to the Moon*, 1728)、“V 某某男爵夫人”的《飞行坦克》(*The Flying Tank*, 1783)、匿名作者的《新月球之旅趣味记叙》(*Interesting Account of a New Trip to the Moon*, 1784)、列夫新(Vasilii Levshin)的《最后一趟旅程》(*The Late Journey*, 1784)、朱可夫(Mikhail Chulkov)的《齐达尔之梦》(*Dream of Kidal*, 1789)、福勒(George Fowler)的《飞向月球:或是朗达尔瑟斯的愿景》(*A Flight to the Moon; or The Vision of Randalthus*, 1813)、伯斯(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的《马祖拉》(*Mazular*, 1832)等皆以夸张手法描述着这个地外世界。其中,17世纪英国的月球书写数量较多,共计有20多部。除《星际信使》外,还有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与星际信使对话》(*Conversation with the Sidereal Messenger*, 1610)和《梦》(*Somnium*, 1634)、邓恩(John Donne)的《依纳爵的秘密会议》(*Ignatius His Conclave*, 1611)及戈德温的《月中人》、威尔金斯的《月球世界的发现》,后续还有琼生(Ben Jonson)的《来自月球新世界的消息》(*News from the New World Discovered in the Moon*, 1620)、摩尔的《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们》(*Democritus Platonissans*, 1646)、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的《大师》(*The Virtuoso*, 1676)、贝恩(Aphra Behn)的《月球皇帝:一场闹剧》(*The Emperor of the Moon: A Farce*, 1687)和赛特尔(Elkanah Settle)的《月球世界》(*The World in the Moon*, 1697)等。同时,相较其他时期,这一时期的月球书写非常特殊。它们延续了前辈书写的虚构性,最明显的当属在旅行工具方面依然借助鸟类或灵媒(天使或魔鬼),如《月中人》里,冈萨雷斯通过搭乘一种名为“甘萨”的野天鹅到了月球。《梦》中,带领主人公前往月球的精灵,能够把月食和日食发生时产生的阴影作为阶梯往来穿梭于地月之间,有时候可以带人类随行。

17世纪的英国月球书写还继承并强化了始自圣文德的基督教化“多重世界”传统。《圣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多重世界”,但宗教改革后的英国社会对“多重世界”的合法性诉求并没有减弱。其中,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里的一段话非常经典:“谁会住在这些世界上呢,如果有地外生物的话,是不是像开普勒所说的理性者?或者他们灵魂要被拯救,或者他们居住的世界要比我们更美好……这些都矛盾,必须做出合理解释才行。”(Burton, 1621:327-328)加之当时月球书写的作者们多有基督教背景,如威尔金斯是接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清教徒,戈德温则是圣公会哈利福特教区主教等。这些个人经历注定他们无法与基督教彻底剥离。最终,月球书写与基督教妥协局面形成:“这个世界就是月球,月球就是我们的地球”(Wilkins, 1638:22-23)。《月中人》中的主人公踏上月球后,见到月球居民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高呼“耶稣”,那里无论“老老少少马上齐齐跪在地上——这让我惊喜万分”(Godwin, 1936:96)。《月球世界的发现》中,主人公认为月球人应该“和我们一样,身负原罪,同时也和我们同样通过耶稣基督之死获得救赎”(Wilkins, 1638:186-192)。琼生的《来自月球新世界的消息》和邓恩的《依纳爵的秘密会议》同样建构了月球基督教世界,那里甚至连教堂都跟罗马的一样。摩尔(More, 1646:19-57)的《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们》里,月球世界同样明显被基督教化,“有多个世界……那无尽的善就是上帝的光明,对我来说理性就是最高的神的善”等。本质上,这些月球书写仅仅是将基督地球拓展到宇宙,那里实际上依然是人类的社会环境。因此,只有将它们放在同一个基督教语境中,所有的故事架构才能被充分理解。

随着新天文学的发展,真实的月球面貌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他们发现在地理特征方面,其跟星球跟地球存在着诸多相似性。这让原先从属于神界的、非物质的飞越地球旅行去处有了实体,也

使基督教化后月球书写中的科学成分增加。表现之一是月球地理知识变多。如《梦》中,精灵对月球地理科普式讲解的专业性之强,被认为是“月球研究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Nicolson, 1940: 259)。《月球世界的发现》的作者威尔金斯则是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英国皇家学会的主要建立者之一。这些科学元素为后续月球书写摆脱基督教控制打下了基础。从17世界末开始,它逐渐褪去宗教色彩,从科学角度论证月球上智慧生物存在的可能性。威廉·赫歇尔爵士(Sir William Herschel)在论文《月球上的山脉》(Observations on the Mountains of the Moon, 1780)里强调其表面有适合人类居住的森林。格鲁依图依森(Franz Von Paula Gruithuisen)则从月球表面温度分析生物在那里生存的可能性等。表现之二是17世纪的月球书写已出现了20世纪才成功发明的宇宙旅行者:人工翅膀、大风箏或其他飞行机器等。

月球生物的想法是迈向多重世界智性之途的第一步。进入20世纪后,随着1969年人类踏上月球,纯粹以假设为基础的月球书写戛然而止,转而与多个学科融合共生,其在各个领域的贡献也得到深入探讨。哲学方面有斯蒂文·J.迪克(Steven J. Dick)的《多重世界:德谟克利特到康德之间地外生物讨论的起源》(Plurality of Worlds: The Origins of the Extraterrestrial Life Debate from Democritus to Kant, 1982),文化领域有司各特·L.蒙哥马利(Scott L. Montgomery)的《月球与西方想象》(The Moon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1999)和卡尔·S.古特克(Karl S. Guthke)的论文“噩梦与乌托邦:从伽利略到各个地外世界”(Nightmare and Utopia: Extraterrestrial Worlds from Galileo to Goethe, 2003)等。可见,月球书写的影响和贡献已辐射至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宇宙旅行文学”则成为科幻文学的主要分支。

3 中和: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多重世界”

作为“一部独特的宇宙史诗”(Sarkar, 2012: 185),弥尔顿《失乐园》“可能是高格调作品中,最伟大的宇宙旅行书写”(Tanner, 1986: 268)。贯穿这部作品的各色旅行中,撒旦的地外之旅排在首位。他从地狱启程,穿越“浑沌”后抵达新世界。全诗中,穿插其间的还有许多以飞行方式往来天堂和新世界等地的天使:如太阳守护者尤烈儿下降到乐园,然后返回太阳,又去了天堂,再如拉斐尔、加百列和米迦勒也是如此。撒旦眼里,人类也能自由地飞行:“他所创造的神奇作品,尤其是人,他最喜欢最宠爱的人……这些星球都任他选住?”^①(3. 663-668)。《失乐园》中,所有宇宙旅行者的移动速度都非常快,其中撒旦的双翼、尤烈儿的太阳光线等都无法量化的飞行工具,拉斐尔甚至惊叹自己位置变换之快,“我早晨从天上上帝的住处出发,中午以前就到达伊甸,其距离之远,不是可以名言的数字所能表达的”(8. 110-113)。

目前,关于《失乐园》中的“多重世界”研究很少。格兰特·麦考利(Grant McColley)的论文“作为弥尔顿对哥白尼地心假设支持的多重世界”(The Theory of a Plurality of Worlds as a Factor in Milton's Attitude Toward the Copernican Hypothesis)最具代表性。但它年代久远,发表于1932年,之后学界再无相关产出。一定程度上,这与其因“中和”特征难以定位和辨识有关。对待“多重世界”的态度方面,《失乐园》中和了开普勒的“激进”和伽利略的“保守”。弥尔顿出生于1608年,虽然距离布鲁诺被烧死

^①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后文《失乐园》的引用皆出自该译本,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失乐园》的卷和引文行数,其他不再另注。

才八年,《星际信使》出版也就两年时间,但到了他上大学时,部分新天文知识已进入英国大学课程,他对“多重世界”设想应该不陌生。但作为一名“共和国卫士”(陶久胜,2023:84)和以维护德行、理性和秩序著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历史传承中最后一个伟大的倡导者”(Bush, 1950:101),其处理问题时考虑的因素更多,即使偶有激进时刻,大多数表达相对委婉,因为他明白有些问题表面上是科学与宗教之争,实则是新、旧两种世界观之争,更是政治立场和权力的角斗。这也让学界常常难以定论其作品,甚至有时候同一部作品会有完全相反的解读。《失乐园》便是这样一部作品。这与弥尔顿创作时的中和态度有关。开普勒和伽利略对其形成影响很大。望远镜发明后,《星际信使》出版前,伽利略曾致信咨询开普勒的意见。尽管后者深知布鲁诺的下场和罗马教廷对“多重世界”的态度,依然积极回应,并发表一篇简短的回复——《与星际信使对话》,公开支持对方并提出自己对地外生命的一些推测:“可能有人会说,天空中是否还有跟地球相似的星球,我们会不会和他们争夺宇宙资源?如果他们的星球更高贵,我们就不是最高贵的理性生物了。那么,我们怎么成为上帝所造万物的主人呢”(Kepler, 1965:43),同时“任何重要到拥有卫星的行星必定也拥有‘人类’……反过来,每颗行星和行星上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卫星为其效力”(Kepler, 1965:47-49)。开普勒的这番言论在当时相当激进。相比之下,伽利略从未评论过他的《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可见二人对“多重世界”的态度虽然本质上一致,公开表现却差异巨大。新教徒开普勒的故乡德国威登堡被誉为“当时的新文化中心”(朱维之等,1985:136)。它是路德宗教改革发源地,对各种思想也比较宽容,也是欧洲第一个公开教授日心说课程的地方。这与1541年末,曾求学于哥白尼门下的雷蒂库斯返回后,积极张罗出版《天体运行论》有关。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正是在那里完成了大学学业。伽利略则是意大利虔诚的基督教徒,出于对复杂局面的判断和自保,对“多重世界”相对保守。所处宗教、政治生活环境与之非常相似的弥尔顿对其更加欣赏,除了亲自拜访,除了让他成为《失乐园》的唯一同时代人,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对方在“多重世界”方面的保守态度。

宏观上看,《失乐园》由四个“地外世界”构成:顶端是上帝、圣子和众天使居住的“天堂”,往下是“混沌”,然后是由一根金链垂挂在天庭下方像球一样的新世界,最底端是撒旦和反叛天使们被打入的地狱。微观上看,新世界又是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地外世界”“里面住有叫做‘人’的新族类,同我们相似,只不过在权力和优雅方面比我们差一点”(2.349-351),但小到“好像月亮旁边一个最微细的星球”(2.1047)。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弥尔顿本人支持的宇宙模式争论不断。一种说法是“是托勒密式的”(Poole, 2004:28),是“已被抛弃的、古老的托勒密图景的捍卫者”(Lewis, 1964:89)。另一种声音则认为身处新天文学浪潮和社会变革中的弥尔顿不断地诉求着新宇宙模式。丹尼斯·丹尼尔森(Dennis Danielson)为此还撰写了《〈失乐园〉和宇宙学革命》(*Paradise Lost and The Cosmological Revolution*),以论证弥尔顿的反旧天文学书写。《失乐园》中的“多重世界”则是探究该争论的绝佳视角:他在内容上中和了新、旧两种宇宙模式,既巧妙地呈现了二者的争论又避免成为相互之间批判的标靶。

一方面,《失乐园》里的“多重世界”符合“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从中世纪起,哲学家和神学家等将始自古希腊的该模式与基督教相结合,其静止、稳定、富有秩序的结构也随之被概念化为社会“集体意识”,此后一直占据社会主流位置。《失乐园》再现了这种宇宙模式:首先,宇宙万物皆由上帝制造,“这时全能的天父从天上,从他所坐的高高的诸天之上的清虚境,向下瞰视自己的作品和作品的作品,都一览无余”(3.57-60)。“新世界”也是如此,“由于上帝一声号令,你便像一件

大氅披盖那从空虚、无形无限中新兴的,黑暗、深沉、苍苍茫茫的新世界”(3.9-12)。甚至撒旦也是他的作品,上帝直言“我凭正直公平创造了他”(3.99)。撒旦则一度“唱着天庭诗神所教的新曲”(3.17)以示二者的渊源关系。其次,《失乐园》中的宇宙构造符合该模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最早由亚里士多德在大量观测的基础上提出:宇宙是一个同心球体系,就像洋葱一样是一层一层的结构:地球在中心,地球之外依次是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的各组天球,最外面是恒星天球,这个巨大的天球共有56层,每层天球像水晶球那样透明,后世又增加了“水晶天”和“原动天”。十个同心球围绕着固定地球匀速圆周运动。这对应于弥尔顿的描述,他们通过“七星天”,通过“恒星天”,通过那权衡黄道振动均势的“水晶天”,并且还通过“原动天”(3.484-486)。最后,《失乐园》里的舞乐再现着“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的和谐特征。“他们的圣歌,挑醒高度的欢喜。那乐歌中没有噪音,没有不谐之声,只有美妙的和声,构成天上的仙乐”(3.369-371)、“众星宿按着日、月、年的计数顺序,有节奏地跳着星星的舞蹈而运行”(3.578-580)等。蒂利亚德(Tillyard, 1944:94)认为构成16、17世纪英国社会的隐喻方式之一是“宇宙舞蹈”,其源自“宇宙音乐”。“从早期希腊哲学家开始,创世就被构想成一种音乐”。它由毕达哥拉斯提出:各星体做圆周运动时,会发生音乐,因为运动是事物的本质,故世间万物无时不刻都在产生音乐,乐声随体积大小而高低不同。因为星体体积最大,故“宇宙音乐”即“天体音乐”。这些舞乐后来被融入“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中,成为再现当时和谐社会的主要证明和特征。

另一方面,《失乐园》中的各个“多重世界”又多有反“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之处。有些否定天球运行的轨迹:“说什么用同心圆和异心圆,天圈和周转圈,圈中的圈,来圈住这个大球等说法,离奇可笑。”(8.81-83)有些否定天球运行的轨道:撒旦在宇宙中飞行时畅通无阻,没有遇到任何“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中所假设的有形轨道。有些则以肯定地球自转的方式进行:“天体确实在运动着,我这么强调,是怕我的话不足以消释你的疑虑,认为天体根本不动,那是你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看来好像如此”(8.114-118)。有些则直接忽视地球的地位:“他望见地球,和其他闪烁的星球一样”(5.457-458)、“比起苍天和那么多的全部尾星来只不过是一点、一粒、一个原子”(8.16-17)。有些则违反“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的封闭性:一端由天堂垂下的金链系着,位于地球上某处的“新世界”被“坚硬而粗糙的球面”(3.420)覆盖,只留有一个天梯大小的孔方便出入。同时,弥尔顿还数次提到的“无限”:“群星似乎巡回于无限的空间”(8.18)、“一声号令,你便像一件大氅披盖那从空虚、无形无限中新兴的,黑暗、深沉、苍苍茫茫的新世界”(3.10-12)、“浑沌是无边无际的,为了充满在那里面的我是无限的,空间并不空”(7.168-169),等等。

最后,它中和了月球书写与其他星球书写。《失乐园》中频频提及月球,有些地方与伽利略《星际使者》中的描述保持一致:“好像一轮明月挂在他的双肩,就是那个突斯岗的大师在黄昏时分,于飞索尔山顶,或瓦达诺山谷,用望远镜探望到的有新地和河山,满布斑纹的月轮”(1.287-291)、“月光没有那么亮”(7.376)。有些地方强调月球是可能居住地,“有些人梦想,寄托在邻近的月球上,那也是荒谬的。在那银色的世界里,有近乎真实的居民,有超升的圣者,有介乎天使和人类之间的中性精灵;有神的众子和人间女子所生的巨人族,首先从古代世界来,当时很出名,还带来了许多虚空的功业”(3.459-465)。最明显的当属拉斐尔的话:“月球上似乎也有陆地、田野和居民,她的斑点看来像是云,云会降雨,雨在软土中产生果实,预备给住在那里的人食用”(8.144-147)。这些符合当时英国月球书写的潮流,但弥尔顿又不拘于此,他还将“多重世界”的范围延伸至其他星球:“这

些发光的星球中,哪个安置人,哪个不安置人,或者是这些星球都任他选住?”(3. 665-668),“别的太阳,恐怕也有他们的侍女”(8. 145),“阳光与阳光,这伟大的两性,赋予世界以活气,储藏在各个星球里,那里恐怕也有生物”(8. 148-150)。

虽然“多重世界”是《失乐园》这部宇宙旅行文学所要传递的内容之一,但因时代限制,弥尔顿采用了伽利略式保守式书写而非像开普勒一样激进表达。不仅如此,他还“多重世界”放置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月球书写和其他星球书写中,旨在让其更为隐蔽。从当时背景看,这的确是一种免于批判的安全之举,但也直接造成弥尔顿“多重世界”乃至其新天文学思想研究稀少。如果说这些研究因17世纪英国各种宗教势力庞大复杂、政治动荡多变而成为无法进行的禁区,那么在当下,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它将成为我们思考许多宇宙前沿问题的重要文献。

4 结语

宇宙中茫茫星海,地球是目前人类已知唯一有生命的星球,很多人相信我们并不孤单。所以一直以来,寻找地外生命的尝试从未停止过。16、17世纪在这一方面是个特殊时期: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天文学就占有重要的地位。结构上静止稳定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模式”更因符合中世纪教权和文艺复兴王权的理想社会状态,被概念化为社会“集体意识”,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从中世纪开始牢牢地居于主流地位,也禁锢着人们的宇宙想象。随着哥白尼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一系列新的有形宇宙假设相继出现、多种观测仪器发明更新迭代,人类的宇宙想象也不断延伸。在17世纪,一度因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而沉寂的宇宙旅行文学再次流行,“多重世界”观念也随之复苏。在这方面,弥尔顿的《失乐园》虽因“中和”特征极其隐蔽,却无损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 Burton, R. 1621. *Anatomy of Melancholy* [M]. London: Spectacl Press.
- Bush, Douglas. 1950. *Science and English Poetry: A Historical Sketch*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M. B. 1999. *Wonder and Science: Imagining World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ffin, C. M. 1937. *John Donne and the New Philosoph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ressy, F. 2006. Early Modern Space Travel and the English Man in the Moon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961-982.
- Crowe, M. J. & Matthew F. 2013. The Extraterrestrial Life Debate From Antiquity to 1900 [G]// Vakoch, D. A. *Astrobiology, History, and Society: Life Beyond Earth and the Impact of Discovery*. Berlin: Springer Press.
- Daneau, L. 1579. *The Wonderful Workmanship of the World* [M]. London: Spectacl Pless.
- Dick, S. 1982. *Plurality of Worlds: The Origins of the Extraterrestrial Life Debate from Democritus to Ka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mpson, W. 1957. *Donne the Space Man* [J]. *The Kenyon Review* (3): 337-399.
- Godwin, F. 1936. *The Man in the Moon: or, A Discourse of a Voyage* [M]. Ottawa: Dovehouse Editions.
- Kepler, J. 1965. *Kepler's Conversation with Galileo's Sidereal Messenger* [M]. New York: Kuhn Press.
- Lewis, C. S. 1964. *The Discarded Image: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colson, M. H. 1940. Cosmic Voyages [J].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2): 56-95.
- Nicolson, M. H. 1948. *Voyages to the Moon* [M]. New York: Macmillan.

- More, H. 1646. *Democritus Platonissa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ole, W. 2004. Milton and Science: A Caveat [J]. *Milton Quarterly* (1): 24-36.
- Sarkar, M. 2012. *Cosmos and Character in Paradise Lost*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anner, R. 1986. “And Every Star Perhaps a World of Destined Habitation”: Milton and Moonmen [J]. *Extrapolation* (3): 257-272.
- Tillyard, E. M. W. 1944.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A Study of the Idea of Order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Donne & Milton*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 Wilkins, J. 1638. *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 Moon* [M]. London: Spectacl Press.
- 卢克莱修. 1981. 物性论 [M]. 方书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陶久胜. 2023. 英国复辟时期的神圣国家构想: 弥尔顿诗歌中的殖民、狂热与反帝国主义 [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84-90+154.
- 托比阿斯·胡阿特, 马克斯·劳纳. 2016. 多重宇宙 [M]. 车云,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朱维之, 赵澧. 1985. 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亚当·罗伯茨. 2010. 科幻小说史 [M]. 马小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Moon Writings and Milton's *Paradise Lost*: “Other Worlds” in 17th-Century England's Cosmic Voyage Literature

ZHANG Jianping TIAN Junwu

Abstrac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in 1543, “new astronomy” achiev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a series of tangible universe hypotheses different from the “Aristotelian-Ptolemaic geocentric model”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Meanwhile, various subsequent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techniques and practices made rapid progress. In this context, the “Cosmic Voyage Literature” dating back to the ancient Greek became popular again, depicting the interactional process among stars, creatures on them and so on. “Other Worlds” is the object of this writing and the premise of its existence. Because 17th-century England coincides with the conflicting of new and old astronomy, the concept of “Other Worlds” is very special. Firstly, it finally had to compromise to be a Christian world. Secondly, the moon was multi-focused by Galileo and others, so the “Other Worlds” writing often occurred there until Newton published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in 1687. The “Other Worlds” in Milton's *Paradise Lost* seemed different from other lunar writings at that time because of its “neutral” characteristics; in attitude, it neutralized Kepler's “radicalism” and Galileo's “conservatism”; in content, it neutralizes the new and old physical universe hypotheses; in scope, it neutralizes moon writing and other planetary writing. Thus Empson names this epic as “Miltonian type” of Cosmic Voyage Literature.

Key words: Other Worlds; Cosmic Voyage Literature; Moon Writings; *Paradise Lost*

责任编辑:冯革